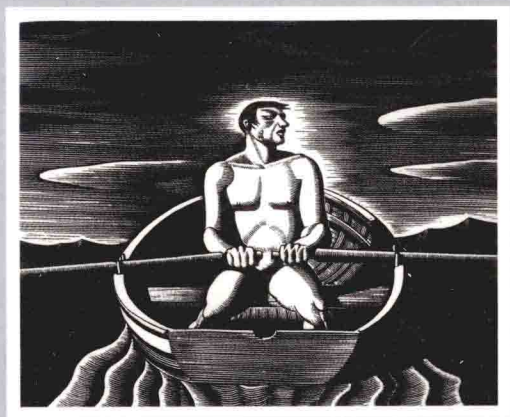


夜听潮集

Y E T I N G C H A O J I



林贤治 著

漓江出版社

夜听潮集

Y E T I N G C H A O J I



林贤治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听潮集/林贤治 著.—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407-7388-5

I. ①夜… II. ①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67.1②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5263 号

组 稿:郑纳新

责任编辑:周向荣

装帧设计:居 居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1 字数:25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7.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目 录

题 记 /1

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 /3

迫害与写作 /16

告密、记忆及其他 /37

关于欧洲的三本书 /50

美国知识分子 /57

《人文经典》序言 /61

“哲学船”：从启程到返航 /65

后集权时代：黄昏，还是黎明？ /73

萨米亚特：苏联东欧的地下出版物 /81

审查制度与秘密阅读 /92

西方的眼光，东方的故事 /101

被禁锢的头脑 /107

同在寒星下 /117
米雪尔：比男人伟大 /124
见证：一个人的斗争史 /142
孤独的异邦人 /156
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 /164
赫塔·米勒：带手绢的作家 /173
如何可能写出失去母亲的哀痛 /182

重寻五四 /188
九十年：中国文学一瞥 /206
六十年文学史如何书写？ /210
《中篇小说金库》前言 /218

孔子、鲁迅、传统与反传统 /226
读杜甫 /232

秋风秋雨愁煞人 /238
鲁迅：“捧杀”与“骂杀” /257
《圣地野百合》引言 /261
纪念何满子先生 /266
为陈实先生作 /274
追忆与怀想 /282
黑暗的书写者 /295
游牧式写作 /299
王者或草民 /306
新乡土文学二题 /313

《人间鲁迅》第四版后记 /321
《漂泊者萧红》后记 /323
《漂泊者萧红》再版后记 /325

题 记

把集子编完，这才发觉，写下这些芜杂的文字，断续地竟然费去四五年时光。

温良的书桌，太平的市街，所见如是，日复一日，感觉自然变得迟钝起来，仿佛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似的。其实，在这期间，外面的世界变动太大。所谓“大气候”，冻雷轰鸣，风暴四起，雨雪如盖，而且至今似乎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

2008年，“进军华尔街”的喧哗声，犹如上世纪60年代“进军华盛顿”的回响，但是它已不复关涉民权问题，而是源自经济的震荡。两次运动规模浩大而又和平地进行，然后渐趋平复，为社会不同层面所吸收。“中东革命”不同。这是一场酷烈的、持久的斗争，发生在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中的同一种最古老、最封闭、最坚固的文明内部。2011年春，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开始，一连波及数个国家，有如骨牌效应，一些铁腕人物相继应声倒下，或者逃亡，或者囚禁，或者暴亡。卡扎菲由一个叛逆者变成国家恐怖主义者，曾经制造过多起杀人事件，至今我还记得他脸上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穆巴拉克在埃及，如同卡扎菲在利

比亚一样，绝对统治了几十年，虎踞龙盘，想不到在一个早晨就完结了。我到过开罗，看见广场、街道和店铺到处都挂着穆巴拉克的画像，当时就立即想起我国“文革”时的景况。在革命中，政治、宗教、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其中，民主政治的要求是最突出的。戏剧性的是，取代穆巴拉克的穆尔西上台刚满一年，就又被震天的呼啸声所击倒。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在东欧，乌克兰于1991年剧变中摆脱苏联的控制而取得独立，2005年继发“橙色革命”，时隔八年后的今天，民众再次走上独立广场，坚持自由选择，结果把由他们原先选出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抛出了基辅。伟大的戏剧在演出中。在幕布的后面，尽管不同国度、党派和势力的代理人，甚至混有幽灵穿梭往来其间，我确信，人民毕竟存在，而且是这个由手机、互联网以及传统的集会和街垒所搭筑的现代政治舞台的主角。

关于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鲁迅曾经做过一个近于“文学无用论”的演讲，其中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革命是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汇集，许多在书本中夹缠不清、晦暗难明的问题，例如自由、民主、主权等等，都可以从革命的实际变化中找到直接的生动的解释。继柏林墙坍塌之后，海外学者高调宣扬“告别革命”的理论，二十年来，响应者众。虽然，我曾多次作过公开的驳议或迂远的讽说，但是自觉没有力量。如今，革命接踵而至，不因有人“告别”而终结。于是想，远方的涛声与火光，不就是最雄辩的答词吗？何必喋喋乎哉！

集子中的文字，内容不外乎历史、政治、文化与文学，并非专谈革命，但是又不免有所牵涉。只要谈及新旧两个世纪，老实说，要逃避革命的话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全书编定，已是午夜，四周静极。此时，忽然忆起唐人的一句诗“江声夜听潮”，便讨巧用来做书名，没有别的意思。

2014年9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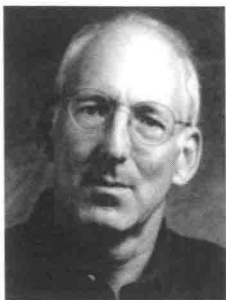
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

两类乌托邦

继《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雅各比又有两种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一种是《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另一种是《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都是关于乌托邦的论著。在一个反乌托邦时代里重绘乌托邦的美好图像，对学者来说实在难得，给人的感觉，恰如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写的那位航海家醒来时所说，这是一缕温煦的微风，带来的是非常美好的慰藉。

雅各比将乌托邦思想区别为两种倾向、两个传统：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用雅各比的话说，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者以英寸和分钟来规划未来，明显带有计划性、规定性和支配性。莫尔的《乌托邦》、贝拉米的《回顾》，都

拉塞尔·雅各比
(1945—)，美国
历史学家、作家、评
论家。著有《最后的
知识分子》《乌托邦
之死》等。



被他划归为这一类型。塔尔蒙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例举的几种，大约也当属这类乌托邦理论。由于雅各比对乌托邦主义取基本肯定的态度，所以，在为乌托邦辩护的时候，他首先把纳粹及晚近的恐怖主义——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同乌托邦划清界限，认为二者毫无共通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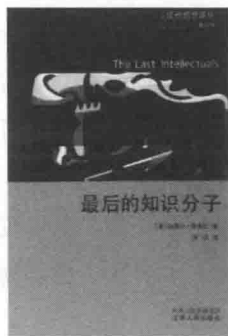
让我们看看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农村每30至40户办一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饭菜统一定量；工人一级劳动力每天3罐大米，二级2.5罐，三级2罐。每人每年发给衣服2套，内衣裤2套，帽1顶，水布1条。按计划，到1977年，每人每星期可以吃2个水果；到1978年，将实现两天1个水果。农田统一改造，所有田地都规定每块大小为100平方米，劳动时必须穿统一的黑色衣服。合作社的学习规定为：每10天学习一次，每次一个半小时，1个月讨论一次，每次3到4小时；每3个月召开一次大会，时间为1天。经济方面，规定种植“战略蔬菜园地”和“战术蔬菜园地”：战略蔬菜为冬瓜、南瓜、空心菜，战术蔬菜则有青菜、菜豆角和茄子等。饮食制度方面，规定每天2顿干饭，1顿稀饭，3天一次甜食，还有，“按党的规定有休息制度”。不知这种极权主义的做法，在雅各比那里算不算蓝图乌托邦，抑或是本来意义上的“敌托邦”？

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相反绝少提供可以把握的东西；关于明天，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图像，它只是一种想象，一道幻影，一个梦想的空间。这样的乌托邦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描绘，甚至从根本上避免描绘，雅各比借了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的开篇这样概括它：“我存在，我们存在。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开始了。”齐诺克在其名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把雅各比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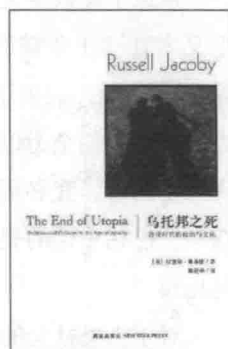
换为一种多元主义的描述：“在乌托邦中，将不是只有一种共同体存在，也不是只有一种生活方式。乌托邦将由各种乌托邦组成，其中有许多相当歧异的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中，人们在不同的制度下过着不同的生活。……乌托邦是各种乌托邦的一个结构，是一个人们可以自由地联合起来，在理想共同体中追求和实行他们自己认为好的生活观念的地方，但在那里，任何人都不可把自己的乌托邦观念强加给别人。乌托邦社会是具有乌托邦精神的社会。”

齐诺克强调的是乌托邦世界中的自由与自治，雅各比的意思同样如此。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不同于蓝图式的乌托邦，就在于不对未来作具体的规限，因为任何规限都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现实不被接受而必要代之以乌托邦者，根本原因正是侵害了公民社会的自由。所以，这样的乌托邦，不能不将其支点从未来转移至当下，所谓未来，实际上是关于反抗现实、颠覆现实的一种欲念，一种渴求，一种意向性；这样的意向集中而强烈，以至实现它的全部目的，仅仅在于促使现存秩序的改变。很明显，自由在这里不是属于未来的，可预约的，而是即时发生的。选择即自由。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其要义乃在于自由反抗本身。

乌托邦是精神性的，自由精神永远无法作强制性的统一。所以，凡思想界的异教徒，对这样的乌托邦都不吝使用溢美之词。



《最后的知识分子》封面



《乌托邦之死》封面

可能性第一，“现实性”第二

美国经济学家、自由意志论者默里·罗思巴德在一篇文章中以19世纪的废奴主义运动作为案例，强调未来目标的重要性，而对保守现存秩序合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予以批评。

罗思巴德指出，不要把战略估计与制定目标相混淆。“首先，人们必须提出目标，在目前的例子中，就是立即废除奴隶制度或任何其他中央集权经济统治的压迫。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这些目标而不是考虑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他说，目标的“现实性”只能从目标本身来考虑，而不能从如何实现它来考虑。劳埃德·加里森是赞成废奴的，但基于战略上的现实主义的考虑，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个目标会很快实现，所以一再宣称废奴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号召进行持久的斗争。可是，后来事实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想，包括加里森本人。奴隶制并不是逐步地，或通过如功利主义者建议采取的补偿奴隶主的方式废除的，而是一下子就废除了。为此，加里森为《解放者》创刊号撰写了一篇很著名的社论，对早先渐进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批判。当诚意的忏悔不能为保守主义者所接受而遭到指责时，加里森进一步宣称：“我需要的是周围燃起熊熊大火，因为我周围有太多的冰山在等待融化。”

从以上废奴主义运动的个例中，罗思巴德总结说，如果废奴主义者在三十年前默不作声，该死的奴隶制度永远也不会被废除；就是说，如果不提出纯洁的目标，就永远不会有现成的动力，推动人们全力以赴，最终到达那里。巴枯宁经常说，为了做到可能的事，我必须想象不可能的事。罗思巴德说的“纯洁的目标”，巴枯宁说的想象中“不可能的事”，就构成了我们常说的乌托邦。

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乌托邦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

它不但确立了目标和方向，还因为它的可欲性，可以唤起人们进行自由反抗和变革现实的热情。雅各布断言，传统的蓝图派乌托邦主义也许会被耗尽，但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作为力量的源泉将是永存的。

革命乌托邦与人文主义传统

关于中国的古代科学，李约瑟曾从观念史的角度出发探究其发展——其实是停滞——的原因，自然也涉及到政治制度。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密尔明确表示说，民主社会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无政府状态或是对变化的狂热，而是一种中国式的停滞不前和凝固不变。在科学史研究方面，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乌托邦的匮乏对科学思想的委顿的影响。

“想象力”，是晚近出现的一个跨学科的重要概念。毋庸讳言，我们整个民族缺乏政治想象力，也缺乏科学想象力。在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里，最为人称道的中国式乌托邦，就是出于陶潜笔下的“桃花源”，以逃避主义体现小康的“和谐”社会。至晚清，有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及后来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夹带一点西方文化的杂碎，但是，思想框架毕竟是儒家的、佛教的、东方的，有均等而无自由，有群体而无个人，与近代的价值观念仍然相隔甚远。

西方人的想象力，可以从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罗马神话得到最初的验证；而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则成为后世乌托邦主义者政治想象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如果要编一部乌托邦史，恐怕还得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算起；西方许多科学著作，其实都可以读作乌托邦著作的。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已故的政治学者茱迪·史珂拉就称之为“一种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这位流亡者的思想，被普遍认为是随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的燎原火种。至

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政治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就更为直接，它对未来的幻想与激情，烧红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大半个天空。革命并非臆想的产物，但是，各式乌托邦为它提前做好临产的准备，并继而推动它的出生、成长和演变，倒是历史上的事实。可以说，只要有革命的地方就有乌托邦；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乌托邦的地方就没有革命。

革命不是天生邪恶的。革命是什么？德国一名不相信乌托邦规则的乌托邦思想家古斯塔夫·兰道尔在其书中援引他对革命的一段充满诗意的描述说：“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时间内，在一种奇特的蜂拥而至的事件中，被压抑的人类热情生长了起来，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均得以实现——恰似燃烧的火炬。在革命中，一切事情的进展都快得令人不可思议，就像一个从世俗的负担中获得了解放的熟睡者的梦那样。”对于社会共同体来说，革命，如果不是作为自由、正义、解放的体现，它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那般惊人的速度前进；即令少数几个革命家拼命鞭打胯下的快马，也将无济于事。

在西方，伴随乌托邦的出现，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在形成、延续并壮大；这样，乌托邦的性质便有了一种内在的规定性。正如雅各比所指出的，乌托邦主义既有蓝图和僵化的规划，也有反偶像崇拜的无边的自由。在专制深处爆发革命，在革命内部形成反革命，——假若从精神的角度看，无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乌托邦主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相互消长或切换。除了人文主义及其传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确保革命的正当性和恒久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革命是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的实现，人文主义的实现。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群起“告别革命”，其在认识论上最大的谬误，就在于：革命异化之后，仍然被称作“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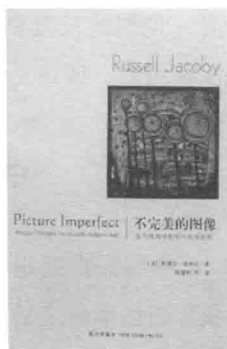
一个反乌托邦主义传统

然而，从头思考革命和反革命精神谈何容易！

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中有专章论反乌托邦思想，其中，现代一批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如科恩、波普尔、塔尔蒙、阿伦特、伯林等，他们在揭示历史命运的残酷法则的同时，几乎把这所有的罪恶和悲剧等同于乌托邦主义。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谱系上，雅各比指出存在着一个反乌托邦主义传统；这些声誉卓著的流亡学者所散布的对乌托邦的敌意，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不断传来爆炸的回声。

对于从波普尔到伯林的自由主义反乌托邦主义者的观点，雅各比在书中做了深入的评述。他强调指出，将乌托邦主义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坚决捍卫乌托邦主义——或者它的反偶像崇拜的版本，表现出了非凡的理论勇气。

二战以来，反乌托邦主义愈演愈烈，至20世纪末，苏联解体，“9·11”恐怖事件等重大事件相继发生，已然成为国内和国际的思想主流。但是，应当看到，坚持乌托邦理想的知识分子仍不乏其人。针对当代对乌托邦主义的敌对观点，曾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的史珂拉公开声明说，她不想加入这种反乌托邦大合唱的队伍之中。正如她所评述的那样，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就有灾难预言者断言，在每一次乌托邦旅程的终点都会出现雅各宾主义和断头台，任何革命都注定以专制统治结束；她指出，这种论断是没有根据的，乌托邦在这里作为恐吓、威胁以及诽谤对手的方式被误用了。她进一步说，这种害怕改变现状并力求结束乌托邦的态度，将



《不完美的图像》封面

使积极的政治思想不复存在，即使所谓的改革能够继续，也是丧失政治活力的。现在，任何人都渴望有改革能力的政治，她据此反复强调，如果人们确实渴望，那么乌托邦是非常有用的，或许是绝对必要的。

中国：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中国原来就是一个缺少乌托邦理想的国度，在经历过浩劫和悲剧性事件之后，乌托邦的完美图像在国人心中几乎完全消失了。

如果说，我们在20世纪后期曾经制造过乌托邦的话，那么大抵是“蓝图”传统的乌托邦。所谓蓝图，除了规定细节之外，还有绝对的、普遍覆盖的一面，实际上同样体现为一种强制性。反乌托邦，倘是反蓝图式的乌托邦，如小说《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极权主义、科学主义那样的乌托邦，其实质与雅各比所称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是一致的。问题是，我们连后者也给“反”掉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海内外评价晚年毛泽东的时候，往往归结到他的“乌托邦主义”，并加以否定。在我们的专家看来，“三面红旗”中如公共食堂、大炼钢铁、除四害、放“卫星”等等，所有荒诞的蓝图都被归纳为毛泽东的诗人的浪漫主义；甚至对“文化大革命”，也做出同样的乌托邦式的阐释。不可思议的是，曾被称为“新左派”的一些人物至今仍然制造毛泽东神话，美化他晚年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把六七十年代描绘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重建蓝图乌托邦。雅各比说的“蓝图”，所指除了未来的维度，还包括对过往历史的重新阐释。我们的学者有所谓的“通三统”，就复制了毛泽东晚年蓝图的部分内容，把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捏合到一起；此间，还

提出“儒教社会主义国家”的乌托邦概念，说到底仍旧在于维护等级与威权。

在西方，当自由主义者蜕变为保守主义者之后，尚有可取之处在于，他们保守的仍然是自由的残留物。而东方的保守主义者，则只能沦为专制主义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在这里，并没有自由民主的政治资源可供消费，有的只是数千年一贯的封建王朝统治及其意识形态而已。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作“传统文化”，而极力加以维护。90年代，学者顺潮而起，试图颠覆五四，最响亮的口号是反“激进主义”。由此产生更荒诞的比附，就是把五四同“文革”联系起来，说是五四开了“文革”的先河。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创世记”，这时，一切价值被重估，偶像破坏，个性解放，思想多元；其关于“自治”的核心思想及行动原则，对于解构传统的“家天下”及威权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文革”，则是彻底的“一元主义”统治，是被组织，被操纵，表面上看起来颇具无政府主义色彩，实际上是高度集权。红卫兵运动之后，尘埃落定，“全面专政”的本质就看得更清楚了。五四是十足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相反“文革”是狂热的偶像崇拜，崇拜领袖，崇拜集体，崇拜国家。反对五四的乌托邦主义，不管愿意与否，其实都在努力恢复传统乌托邦的“蓝图”规制而已。

上世纪后期经济改革启动，而相应的政治改革滞后，致使精神的真空只能由无尽的物欲去填补。与国家意识形态反复宣传的“稳定性”相对应，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新的价值标准。整个时代的特征不能不是反乌托邦主义的。

乌托邦精神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改写；失去了乌托邦，便意味着对现实的仆役般的忍从。可是，而今谁来构建乌托邦——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